

孔子与三孔

主编 江伟

蓝天出版社



中华文化史集萃 (13)

孔子与三孔

邓之林 编著

蓝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华文化史集萃/江伟主编. - 北京:蓝天出版社, 1998.5

ISBN 7-80081-820-9

I. 中… II. 江… III. 文化史 - 中国 IV. K2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3177 号

蓝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复兴路 14 号)

(邮政编码:100843)

电话:66784244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巨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64 $\frac{3}{8}$ 印张 3757 千字

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(套)

定价:286.00 元(全套 60 本)

前　　言

中华文化源远流长，博大精深，是历代炎黄子孙勤劳和智慧的结晶，是中华先民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。继承并发扬优秀的古文化，让它们服务于今天的社会，是当代国人，尤其是青少年所肩负的历史重任。

我们编写了这套《中华文化史集萃》丛书，从各个方面介绍中华传统文化。在范围选择上，注意覆盖面广，代表性强，使之能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面貌。我们力求用通俗平实的语言把各种文化现象，文化事物的来龙去脉，历史发展，当前状况等，作比较系统的介绍，使之尽可能清晰、逼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，整个编写过程中，我们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，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，注重实用性和借鉴性。我们希望这套书能帮助广大读者有效地继承中华传统文化，取其精髓，去其糟粕，把中华文化发扬光大。

由于水平有限，其中不乏疏漏之处，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编 者

目 录

一 孔子其人	1
二 三孔史话	55
三 孔府	60
四 孔庙	74
五 孔林	93
六 三孔轶事	104

一 孔子其人

孔子是个活生生的人，他的伟大崇高就体现于他一生的存在与努力，他的一生，就是他这种人格精神形成和显示的一生。

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，关于他的生卒，略有不同说法。依《史记》记载，他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（公元前 551 年），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（公元前 479 年）。他的祖先系宋国的贵族，到他的父亲梁纥作了鲁国的武官，才成为鲁国人。虽然孔子的祖先是贵族，到孔子时代已经衰微了，所以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“孔子贫且贱。”当后来别人夸他知道的事多时，他多少是有点自我解嘲地说过：“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。”（《子罕》）但他对于自己在未出仕前学过一些艺能这种事并不过分自卑，更不是羞愧不提。约在二十岁以后，他做过两次小官，一次是做会计的委吏，一次是做管牛羊的乘田。他自己说管会计就把帐目管得妥善；管牛羊时就把牛羊养得肥壮。《孟子·万章下》这已经显示了他以后

的志向高远但不好高骛远，以天下为己任但讲究实际的人生态度。

春秋中期，鲁国在列强争霸的形势中业已衰败，但在文化方面，却仍是历史悠久，文物丰富。对此，晋国的韩宣子和吴公子季札都曾有由衷的赞叹。在这样的氛围中，孔子少年时期就确立了学习的志向，而且他的目的并不是一般地学习一些知识，而是从根本上来研讨寻求合理的人生态度和行事准则。

三十岁在古代已是人到中年，孔子的学问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，在当时，以他的身份尚不能在政治有所建树，于是他选择了一条私人讲学的道路，有了第一批弟子，如年龄最大的颜路、曾点、子路、伯牛以及冉有、子贡、颜渊、闵损等，这都属于前一辈弟子。后来的子游、子夏、曾参等人，则是后辈弟子。他们学习的是诗书六艺，而重点是培养德行，陶冶性情，准备担负起闻道济世的重任。孔子把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与见解，自己的人格与追求，都用一种最为因人施教，最富有启发性的方式传授给他们，平时在学舍讲学讨论，周游列国则师弟同行，随时问难，增加实际的经验。有的弟子学成从政后，仍不断向学请教。形成了中国教育

育史上最早的，最富有吸引力的一种办学形式，也奠定了后来的儒家学派。

孔子本人是有政治理想的，在鲁国没有实现的机会，于是在公元前 517 年离开鲁国来到齐国。“齐景公问政，子曰：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。”（《颜渊》）这是基于他的政治—伦理态度，也是针对他所感觉到的当时齐国君臣状况的不正常而言。据说他还跟齐景公说过节俭的道理。齐景公曾想封给他一块地方，但被晏婴劝阻。有一天齐景公对他说：“吾老矣，不能用也”（《微子》），他明白里面的辞谢之意，就离开齐国了。游齐回鲁后，鲁国的实权仍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，面对这种局面，孔子决意专心从事教育事业，培养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才。鲁国后来发生了一些政治上的动乱，季孙家臣中的阳虎、公山不狃等曾诱召过孔子，但他并没有与之合作，于是鲁定公和季桓子对孔子的从政意愿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信赖，于是在前 501 年孔子 51 岁时，正式任用他为中都宰。这是负责国都的公邑长官，他干了一年，很有成绩，升为司空，又升为司寇。在收回鲁国的失地与遏制家臣势力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。齐国对鲁国的新气象有了担忧，而鲁国因为季孙、叔孙两家的隐患已

除，对孔子也有了慢待。齐景公用离间计，给鲁国送来了八十名美女的乐队，季桓子和鲁定公欣然接受，三日不理朝政。适遇鲁国在郊外祭天后又没有按向来的礼节给孔子送来祭肉，于是孔子不愿再待下去，率领弟子们离开了这个不能施展抱负的“父母之邦”。

他开始了周游列国的十四年。首先是卫国住了一段，发现卫灵公并不信任他，就离开了。离开卫国后，路过名叫匡的地方（今河南长垣县境内），被匡人误以为是阳虎一行而遭围困。离开匡城后曾在晋国边境上逗留，又返回卫国，卫灵公仍并不真心尊重。前 492 年，他带弟子们离开卫国来到宋国，从宋国又到了陈国，在陈国还有过绝粮之厄，后又来到楚地，与楚大夫叶公有相当交往，对于楚昭王也有好评，但毕竟只在楚境停留了一些时日，就离开回卫国了。在这一路上又遇到了一些隐者，这虽然没有动摇他的救世之心，但在情绪上留下了余波，以后在与弟子们的谈话中他流露过对曾点的清高闲散的欣赏与共鸣，显示了他思想深处的另一方面。再次回到卫国后，他的弟子们如子贡、子路多在卫国出仕，卫君也有请孔子正式担任国政的意思，而他提出的当务之急却是“正名”，这连子路

都觉得迂远，卫君更不会接受，所以不久就离开卫国回鲁国了。

鲁国在几年来的国事中，有孔子的弟子出力立功，由此对孔子也有所认识，于是派人带了重礼来迎孔子回国。此时的孔子已是 68 岁的老人了。在如何处理国事的问题上，他与鲁国的实权人物季氏有很大的矛盾，甚至因此与自己的弟子也发生了冲突。“鲁终不能用孔子，孔子亦不求仕。……追迹三代之礼……序书传，上起唐虞之际，下至秦缪，编次其事，故书、传、礼、记自孔氏。……孔子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教，弟子盖三千焉，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。”（《史记、孔子世家》）因此他的晚年，是将教育以及与之相关的古代文献整理作为自己的归宿，将古代文化的精华整理留下，将自己的人生信念和人生智慧讲传给弟子。他感到了“得英才而教育之”（《先进》）的快乐，但也无奈地体味到了“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吾已矣夫”的悲哀（《子罕》）。最终，在自己的深深的遗憾和弟子们的无尽悲伤中死去。

“十五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”（《为政》），孔子用这种简洁的表述来概括他一生心

路历程，他是这么一位有着丰富经历和深邃内涵的人物。关于他的记载相当纷繁，有《春秋》中的孔子，有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中的孔子，有《周易》大传中的孔子，有二戴《礼记》及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中的孔子，有《公羊传》和《谷梁传》中的孔子，但是，历来人们公认，最为可信，也最准确，最有生气地显示了孔子的活生生的存在，显示了孔子思想的丰富深厚，显示了孔子的人格和情趣，则是《论语》。

《论语》为孔子弟子及后学记述孔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。班固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解说《论语》：“《论语》者，孔子应答弟子，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。当时弟子各有所记，夫子既卒，门人相与辑而论纂，故谓之《论语》。”关于它何时成书，从书中对鲁哀公、季康子等死于孔子之后的人称谥，并记有比孔子年少46岁的孔子弟子曾参临死的留言，可见编纂者为孔门再传弟子，成书年代当在战国初期。《论语》在汉代有三种本子：鲁人所传《鲁论语》，齐人所传《齐论语》以及相传出于秦火后曲阜孔府壁中的《古论语》。三种本子的篇数、章次、文字和解说都有出入。三国时何晏汇集汉魏各家注解，作《论语集解》，后

世广为流传。后来的定本，全书共分二十篇，论其总字数，不过一万六千四百多字，然而两千多年来，中国学人对此书的解释发挥，散见者不论，仅成专书者，就有四五百部。南宋理学大儒朱熹的《论语集注》影响极大，元、明、清三代以来七百余年，成为中国识字读书人从童年启蒙到从政处世的一部必读书。

中国历来有“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”的美谈，这种激赏为政治家所说出，又在民间流传。《论语》并不是政治学著作，它所蕴含的精华，不是政治操作的要决，而是一般中国人所认为的好的政治、好的社会、好的人生的基本原理。它是一部分可供哲学、伦理学、政治学、教育学、历史学、文学等多种学科研究者发掘的宝库，更是我们所有的普通人要活得正直、活得坦诚、活得自信、活得舒畅、活得友爱、活得自觉没有辜负这一生的必读之书。

孔子人生准则的核心是“仁”。他人格力量的聚焦点也在于“仁”。对此，《论语》中有大量的论述和记载。对于“仁”，他的标准是既严格又宽泛。

有一次，孟武伯问他：“子路算得上仁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不知道。”孟武伯又问了一遍，孔子才说：“仲由啊，一个有千乘兵车的大国，倒可以让

他去负责军事；至于他有没有仁德，我就不知道了。”“那么冉求怎么样？”孟武伯又问他的另一个弟子。孔子回答道：“冉求呢，一个千户规模的大邑，一个兵车百辆的大家，可以让他当总管，至于他的仁，我就不知道了。”孟武伯还不肯罢休，又问到第三个人：“公西华如何？”孔子的回答仍是：“国家有宾客往来，可以让公西华穿着礼服在朝堂上接待应对，但关于他的仁，我还是不知道。”另外有一次，子张也问及什么样的行为作为才算是“仁”。他问孔子：“令尹子文三次做令尹，不见他有喜色；三次被罢免，不见他有愠色。每次接替，他总是将旧的政令全部告诉新上任的令尹，这个人怎么样？”孔子说：“算得上忠了。”“算不算得上仁呢？”子张追问。孔子用反问回答说：“不知道。怎样才算是仁呢？”子张还想问个究竟出来，又说：“崔子杀了齐国国君，陈文子有四十四马，都舍弃不要而离开齐国。到了别国；他说：‘这儿的大臣与我们那的大夫崔子一样。’就又离开了。再到了一国，又说‘此处大臣与崔子相同。’又离开。这样的人怎么样？”孔子答道：“很清白。”“那么算是仁吗？”孔子的回答还是反问性的：“不知道。怎样才称得上仁呢？”（《公冶长》）

摆在孔子面前的这几位人物，显然都各有自己的长处与美德，而且有的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，也是很难能可贵的，如令尹子文的为官态度。但孔子并不轻易以“仁”相许。在他看来，能干不是仁，高雅风度不是仁，勤谨敬业不算仁，洁身自好也不算仁。这些都不是仁的对立面，但却不是仁本身，因为仁是一种更基本、更为升华的人格力量和人生态度。《论语》中一共有 58 处论“仁”，“仁”字出现了 107 次，在孔子的伦理观、政治观、历史观、教育思想等各个方面，“仁”是一个核心，起着激活、支配、统一的作用，充满生命力地渗透于孔子的哲学。所以，后世又有径将孔子哲学称作“仁学”的。他曾经说过“天地之性人为贵”，说过“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”。《吕氏春秋》上还传有这样一个故事：“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，曰：‘荆人遗之，荆人得之，又何索焉？’孔子闻之曰：‘去其荆而可矣。’老子闻之曰：‘去其人而可矣。’”这是一种泛人类的思想，是一种人文主义思想。根据这种思想，所以他处处要讲人道所当然，人心所不容已，而归结到一个“仁”字上。什么是“仁”？孟子的解释是“仁也者，人也”，“仁，人心也”。《吕氏春秋·不二篇》叙述各

家宗旨，就很明确而扼要地说“孔子贵仁”。

“樊迟问仁。子曰：‘爱人。’问知，子曰：‘知人。’”（《颜渊》）仁者爱人，智者知人，孔子最为关心的是人，他认为智慧的实质就是对人的认识，而“仁”的实质就是对人的热爱。“仁”，首先是孔子对人的一种要求，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期待。

“仁者爱人”，孔子认为这即是一个“仁者”的基本特征。有人认为当时社会中“人”和“民”是两大阶级的对立，民是奴隶，人是奴隶主，因此“爱人”只能说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事。这是缺乏说服力的。从整部《论语》来看，他所言之“人”极为平实，就是包括从贵族到普通人的一切人。《论语·乡党》中有一段记载：“厩焚，子退朝，曰：‘伤人乎？’不问马。”有学者考证，“人”字在战国以前，乃是对于统治阶级的专称，此处孔子所关心的“人”不会是养马者或赶车者，只会是为火而来的士和大夫。这也实在过于勉强了。孔子在这里明明指的是与火灾发生时直接有关的人。难道他真的不把火起在场时的养马者或赶车者视为“人”，所以漠不关心？！实际上，《论语》中之所以记录下了这一则，正是弟子们有感于孔子对于养马者或赶车者这类普通人的关心，在认为马的价值远远大于这

类人的社会观念中，孔子却极为自然地认为他们远比马重要，诚挚地显示了他的“仁者爱人”！

在《奴隶制时代》中郭沫若指出：“人字是大公名，奴隶固然是人，主人也是人，而男人女人都是人。”由于“人”是大公名，所以《左传》上说：“人有十等”（昭公十年），把皂、隶、牧、圉、仆、台都包括在“人”里面，而古书上的“人”和“民”往往也通言不别。如《诗经》“民之无辜，并其臣仆，哀我人斯，于何从禄。”（《小雅·正月》）“何草不黄，何人不矜。哀我征夫，独为匪民。”（《小雅·何草不黄》）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论语》中都有很多“人”、“民”交错互用，或构成“民人”或“人民”复词的例子。这些都足以证明自东周以来“人”即是“民”，也就是“庶人”、“庶民”。

要求无论是在一般的社会心态上或是统治者的政治中，将普通人、劳动者作为“人”来看待，而不是作为会说的畜生或工具来看待，这是孔子关于仁的学说的基点所在，没有了这个基点，孔子“仁学”中的具体内容，如作人的理想、为人修养、处世准则等，就无法展开，也失去了意义。“仁者爱人”的要求，不但是要渗入一般的社会心态、社会价值观念，而且要体现于统治者的政治之中。所